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一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八三期 ——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706g)

| | |
|---------------------|-----|
| 【研究动态】文革史料和史料学概述 | 周 原 |
| 【往事追忆】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 迟泽厚 |
| 【往事如烟】一个普通大学生怎样走入文革 | 聂树人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研究动态】

文革史料和史料学概述

• 周 原 •

对于任何一项历史研究，史料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这是史家共识。现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甚至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1〕文革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是中国通史还是断代史研究，也不管是古代史，现代史还是中共党史，史料学的专著专论都早已层出不穷。〔2〕因而，文革研究的史料和史料学的探讨，决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有前人丰硕的学术成果可以借鉴的。

当前，研究和促进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刊发，不仅是文革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因为，一方面文革的发动距今已经四十周年，亲历者中当年的少年已是“知天命”者，青年步入耆年，而当年中年以上的亲历者则日见稀少。群体记忆正在逐步淡化，日益模糊。鲜活的个人记忆也被岁月剥蚀，并随著记忆者的离世而消失。另一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虽然在系统地整理、出版文化遗产、历史资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比之下，在整理、刊发文革史料、特别是原始资料方面，却是少之又少。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状况在短期内，恐怕难有改观。然而，文革期间的一些原始资料，特别是那些

非正式出版物和印刷品，包括红卫兵小报、内部学习和宣传材料、群众组织印发的传单等等，当年就缺乏系统收集，已收入各级图书馆的，如今又大都尘封日久，乏人整理。这些史料，纸张变黄发脆，墨迹淡化模糊，以至虫蛀发霉。这类史料，急需抢救整理。

研究文革史料和发展文革史料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史料的调查和对其源流与价值的分析，给研究者提供参考，给有志于文革研究的青年学人指点门径；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引起文革研究的学者、图书馆员、档案工作者及关心文革研究的人们的关注，并一起来参与和分担收集、抢救、整理和发布文革史料的重要使命。要知道，搜集、抢救、校勘、整理及刊发文革史料不仅会推动今天的文革研究，而且也会为文革研究的持续进行和将来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源与基础。

◇ 文革史料的类型

一般说来，文革史料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即实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包括文革时的实物如红卫兵的袖章、旧军装、旗帜，各种毛泽东像章、纪念章，批斗会上用的高帽子、黑牌子，打人用的铜头武装带、木枪。再如武斗时使用过的各类武器、宣传话筒，死伤人员的血衣，等等。实物史料也包括重要历史场址、遗迹，如大规模武斗的历史遗址，关斗黑帮的牛棚，“五七干校”的旧址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等等。音像史料包括文革时期录制发行的录影、录音资料以及图片画册，诸如记录片、样板戏影片、电视节目、歌曲集、唱片等。文革时期大行于世的招贴画、宣传画以及其他照片、幻灯片等也是珍贵的史料。口碑史料包括所谓口述历史、民间口耳相传的文革故事、往事、传闻等，但这一部分资料势必要记录成文字或经录音、录影后，才能成为史料。最后一类为文字史料，这类史料数量最多，流传最广，记录史实最具体、详细，是文革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如果依时间划分，文革史料又可分为1）文革期间产生的史料，和2）文革结束后产生的史料。本文先集中谈一下文革期间的各种资料，而将文革后发布的史料放在第二部分，即文革史料的收集、整理、发布与研究部分一并讨论。

根据发布和制作的方式，文革期间产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为：1）正式出版物，2）非正式出版物，3）非出版印刷品，和4）非印刷品资料。下面就每一类，做一简要介绍分析。

一、文革期间的正式出版物

文革期间，特别是1966到1969年间是正式出版物十分凋敝的阶段。各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许多报刊被迫停刊。图书的出版发行则呈畸形状态。一方面，图书出版的种类和数量，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图书出版，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则一版再版，发行量连创纪录。尽管如此，文革期间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基本资料，例如，被视为当权者喉舌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此外，《文汇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等也含有许多重要史料。至于各省市级的报刊虽然连篇累牍地大量转载新华社、中央及上海报刊的内容，甚少新意，但仍然记载了各地文革期间的重大事件，反映出该地文革进展的特点，不失为研究地方文革史的基本的、也是比较易得的史料。在期刊中，文革中期出现于上海的《学习与批判》，以及后期的《北京大学学报》和《复旦大学学报》等都收有相关时期的有用文献。至于图书，为配合各个时期运动重点而出版的毛泽东最新或专题指示汇编，各种政治运动的小册子，政治学习辅导材料，大批判文集，学大寨、学大庆、学解放军等宣传品，甚或样板戏剧本及少得可怜的文学作品，都可成为研究文革某一阶段或某一专题的有用资料。

二、文革期间的非正式出版物

这类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众组织、红卫兵等印行的各类小报、刊物、海报、传单和小册子等。其特点是虽无正式出版社介入，却是公开出版，旨在发行、广为流通的。这类出版物主要见于文革之初的前三年（1966—1968）。与当时官方出版物一派凋敝的景象形成对比的是此间非官方出版物的空前繁荣。初步估计，仅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类小报一项在全国就有八、九千种之多。小报主要是自办自销，流通则或免费散发，或沿街叫卖。有些影响较大的小报，则可以通过邮局订阅。如此众多的非官方报纸在数年间广为流行，这种状况不仅是中共建国以来所仅见，在中国一百多年的报刊史上也是空前的。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文革带来了出版自由。事实上，文革的领导者们对这些非官方的小报采取不仅容忍而且支持的态度，是由于它们在深入发动和推进文革的许多环节上起到了官方舆论工具所起不到的作用。而一旦有人胆敢利用小报挑战当局或“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定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由遇罗克主笔并参与出版的《中学文革报》因发表挑战中共阶级路线的《出身论》等文章而遭取缔的事例，就是一个明证。

总体上说，群众组织的小报，特别是铅印发行、质量较高的小报是反映这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系统、某一单位、某一组织文革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最系统、最详尽的文字，也是我们所知的现今保存较全和整理较好的史料。对于文革初期的社会运动，基层情况，特别是地方文革史的研究来说，小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有时甚至是现今仍存的、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

文革期间的非正式出版物也包括一些群众组织出版的刊物，其在种类上大大少于小报。而且，不定期出版的或专辑、专刊性质者居多，定期出版的刊物则比较少见。这恐怕是与文革初期运动发展疾风暴雨、政治气候瞬息万变，出版周期偏长的定期期刊不能满足群众组织在政治宣传、舆论造势以至派性斗争方面的需要所分不开的。

三、文革期间的非出版印刷品

这部分资料专指那种文革期间印制的，限于小范围使用或仅在特定范围内流通，不对公众发行的印刷品。例如，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文件、讲话汇编、各种内部学习资料、大批判文集、大字报选以及斗私批修的心得等等。这部分资料的特点是种类庞杂，数量极多，内容常有重复而发布范围较小，给收集、挑选、鉴别和校勘带来一定困难。尽管此类资料并不都有收藏价值，但其中有重要价值者也很多。如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收集了许多未曾正式发表的毛的文稿、讲话、批示和谈话。又如篇幅不一、版本各异的《中央首长讲话汇编》，以及运动各阶段，如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整风的档案、讲话、学习材料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对这部分资料的整理发布，已有一些成果，后文将予介绍。另外，还有一部分数量很大的、属于这一类或上一类（即非正式出版物）的油印资料，包括油印小报、毛、林指示和首长讲话传抄、快讯、传单及大、小字报等。这部分资料内容更杂，纸张、油墨和装订质量最差，已经散佚和正在散佚的数量最多，急需抢救。总体上说，非出版印刷品、特别是油印的资料在收集、挑选、整理和发布工作上，难度最大，目前已有的成果也最少。

非出版印刷品中，也包括少量官方印刷的、供传达、学习和执行的档案。这类档案常常用来指导运动，反映文革领导人和各级权力机构的意图、政策、计画、和对运动的判断，对于文革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档案因当年冠以的保密级别和发放的范围不同，收集的难度也不一样。

四、文革期间的非印刷品资料

这类史料中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是各级各类档案。尽管文革期间各级政府部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商学各个单位都没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档案的工作。档案的内容品种很多，包括指示、会议记录、简报、总结、统计、下达的档案和上报的材料等等。除此还有个人档案，包括所谓专案材料，像本人写的检查、“交待”，他人写的揭发、检举、证言等。档案提供原始资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自明的。在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一些档案已经经过废品回收站，在国内一些地摊上可以买到。当然，开放文革档案，特别是中央一级的档案供研究者使用，看来仍是遥遥无期。

除档案外，非印刷品文革资料还包括大字报、小字报、日记等。大字报、小字报除当时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凤毛麟角了。个人笔记、日记得以留存的机会应比大、小字报大些。这些资料，特别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资料。

◇ 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

一、文革期间的工作与成果

对文革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大陆境外自文革期间就已经开始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和欧洲都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其中比较著名的如香港友联研究所，它在文革发动后不久就开始著力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也做了一些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如该所编印的《红卫兵资料目录》（1970），著录该所收藏的红卫兵小报561种；又如该所编印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关于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缩微胶卷型式出版的《中共资料剪辑》（1974）。《中共资料剪辑》共1，447卷，含该所收集的文革期间的各类简报资料，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教育、财政、侨务等。在台湾，搜集比较用力的单位有中央图书馆、国立政治大学及其下属的国际研究中心图书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军情局等。台湾出版的资料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报》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专题汇编，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1973）等。这些都成为文革期间以至以后海外学者研究文革不可缺少的资料。欧美及日本等地的搜集工作主要是由设有中文馆藏的大学和研究图书馆所进行的。总的说，受资料来源和供货渠道的限制，成果有限。

在中国大陆，当年对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级图书馆进行的，且通常为被动的收集。但也有少数主动去搜访这些资料，如北京图书馆就曾经在1966年8月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出过〈把这些珍贵文献记录下来〉的保存史料的号召。³ 除图书馆外，大陆还有许多私人收藏，其中也不乏有分量、有特点者。在文革期间，正式出版物以外，大陆对其他文革资料的整理、发布工作，基本上没有进行。

二、文革后的工作与成果

1、大陆方面的进展

尽管文革研究在大陆仍然设有许多禁区，当局对文革研究和文革类书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较紧，不时干预施压，三十年来还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除学人们所熟知的研究文革全程的历史著作，如严家琪、高皋的《中国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等，还有许多类别不同的出版物和资料，下面就每类举其要者，罗列一二，以资说明：

A、大事记及编年史性质的史料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50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此书以编年体记事，自1949至1999年每年一卷，文革十年亦不例外；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5卷10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其中第三卷两册为《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再如《共和国史记》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其卷三为“神州板荡”，记述文革十年。这类史料不但是研究者在查证某一时间、事件或史实时所不可少，还有助于研究者较系统地了解某些事件发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以至相关事件在时间上或因果方面的联系。

B、中共有关领导人的著作、文稿

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998），《周恩来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80），《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邓小平文选》3卷（人民出版社，1983）和《刘少奇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81—85）等。虽然这些出版物收选的著作在时间跨度上涵盖著作人的一生，但都不同程度地收有著作人在文革期间及（或）文革前夜的一些著作和讲话，无疑都是研究文革的重要资料。

C、资料汇编

最有价值的首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内部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3卷，1988年）。这一大型资料集由文革史专家王年一选编，包括了上千份中共中央文件、报刊社论、重要首长讲话和回忆录，对文革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其他公开出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和团结出版社所出六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1949—1995》（1996）；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 1949—1992》4卷（红旗出版社，1993），其中第三卷为1966—1976年，包括总论、重大事件、典章制度、文献选编及文献资料等部分。这些大书除提供一些提纲契领式的述外，最重要的是汇编了一些原始的文献与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D、纪事本末体资料

如《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7卷（辽人民出版社，2003），其中第五卷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其中第三卷“十年风雨”所含为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事件；再如一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亦含有几十条文革期间事件的条目。顾名思义，这类著作以文革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为记述对象，撰者力求对所事件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描述，因此在搞清某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变化以至结局等方面尤为下力，是文革研究者应该重视的资料与研究成果。

E、回忆录、亲历记

这类资料已出版的不算太少，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众人的片断回忆，编汇成集。如者永平、关圣力等主编的《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远方出版社，1998）；又如《无罪流放：66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等。二是个人亲历记式的回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季羨林的《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纪希晨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元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

民日报出版社，2001）以及汪东兴的《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等。三是自传体式的回忆录，这种回忆录记述的年代，常常不限于文革十年，而是作者的一生或一个时期但含文革时期，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和江渭清的《七十年征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

F、传记、传记文学

这类资料出版的相对较多，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官方组织力量撰写的，多为身居要职的“正面”人物所撰，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陈毅等人的传记。二是传主的亲朋或属下写的，如邓榕（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黄编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罗）点点的《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等。第三种是职业作家采访撰写而成的，如叶永烈的王、江、张、姚以及陈伯达的系列传记，权延赤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和《龙困：贺龙与薛明》（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等。第四种是散见于报端杂志的小传，虽篇幅较短但数量颇多；也有编辑成册的，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系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

G、词典、事典、年谱等工具书

较为重要的工具书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三卷本，1991年初版，2001年增订本。第一卷人物卷收有大量文革时期中共领导人的辞条，第三卷记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包括一些有关文革的条目；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又如金春明等编著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是一本较早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准词典。年谱类如《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和《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修订本1998）等。这类年谱看似以流水账般简记谱主生平，文献价值不高。但其实不然，细读会不时发现一些鲜见的史实或细节，有些史实是首次披露于公众或被官方证实。

H、报刊文章

介绍、研究文革的文章以及文革事件、人物的回忆录、纪念文章自文革结束以来，就有见诸报端，随政治气候的变化，时多时少。而近年来数量有明显增加。常刊载这类文章的期刊有《中共党史研究》、《炎黄春秋》、《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纵横》、《党史博览》、《党史博采》等等。

再有，技术革命带来了近年间电子出版物和文献数位化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及一些杂志有了光碟版或网路版，虽然电子版在内容上并未增加新的史料，却给研究者查找、利用这些史料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综观已有的成果，这些年来，大陆陆续出版了一些有价值的文革史专著、资料、回忆录、传记、传记文学和工具书，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革的回忆、追述和研究文革的论文也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长。这一方面反映出学者、亲历者对追述、研究这段历史难以压制的兴趣和愿望以及出版社、杂志社一些编辑人员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对文革研究在控制策略上有所变化。从以压制和限制为基本态度的方针，转变为限制性“开放”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官方、半官方性质的大事记、工具书、及撰史活动持相对开放、甚至鼓励态度，另一方面对相

对独立的研究者、亲历者的撰史和研究活动则继续采取不鼓励和严格审查的限制态度，以期影响文革研究的话语，制导甚至把握话语权，把文革研究尽可能纳入和控制官方史学的轨道。还有一点应指出的是，市场的力量对有关文革的图书、传记文学、论文等出版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这类图书、文章有广大的读者群，发行量和利润都比较大，促使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知难而上，找变通办法，打擦边球。

2. 香港（台湾）方面的进展

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环境，在出版文革资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香港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块独特的园地，贡献很大。如前所述，还在文革期间，搜集、整理文革资料，出版、发表有关文革的图书、研究成果就已经在香港开展得很活跃。文革结束以来，又出版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和有关图书。这些图书资料有些是大陆学者、亲历者所撰，但不宜或无法在大陆出版，有些则是在海外和香港的学者、研究者所为。这里就重要者，作一简述。与香港相比，台湾的文革出版物实在太少，本文就不再专门设章节研究。但是今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杀劫》（图文集）和《西藏记忆》（口述史）却是意外地填补了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西藏文革。

A、词典、工具书

如《文化大革命词典》巢峰主编（港龙出版社，1993），又如赵无眠编著的《文革大年表》（明镜出版社，1996）等。

B、回忆录、追述、亲历记等

这些重要的回忆录均是涉及上层政治斗争内幕，在大陆无法出版的。如陈伯达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和《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杨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王力的《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和《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张的《尘劫》（明报出版社，1997），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开放杂志社，2004）等。

C、资料汇编

最重要者当属《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宋永毅主编，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它开启了使用当代电脑技术保存、校勘、整理和重印文革史料的先例和风气。这张光碟共分七个部分，分别为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林彪讲话、指示和文章，中央首长讲话和指示，重要报刊社论文章，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和异端思潮重要文献，是由八位海外学者（宋永毅、石之瑜、丁抒、周原、沉志佳、郭建、周泽浩、王友琴）合力汇编而成。文库共收一万多篇文献，近三千万字，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其中中共档案，毛、林讲话、指示和中央首长讲话是研究文革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必不可少的原始文献。而报刊社论、红卫兵运动和异端思潮等重要文献，也是研究者做有关专题研究时，一定要研读的基本资料。与光碟一并发行的还有中英文双语的目录一册，方便使用者流览查阅。光碟自2002年出版后，海内外许多文革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为编者提供了一些未收的资料和好的建议，编委会也陆续搜集到了一些新的资料。为此，编委会对《文库》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增补和重新校勘的工作，于2006年年底推出了第二版。第二版分两种版本，即

面向世界各地图书馆和机构用户的互联网网路版和面向个人研究者的光碟版。第二版新增的文献有近千篇，约五百万字。而互联网版在利用文献组织与传播的新技术方面，较之前面的光碟版又进一步，不仅具备包括全文检索在内的多样化的检索功能，而且对图书馆与研究机构而言，网路版比光碟版少受地域与时间上的限制，为读者、研究者从他们自己的办公室、居住地“全天候”使用提供方便。

还有一本十分重要的资料是杨克林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初版，2002再版）。这是一套两卷本的文革时期的照片集，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除资料汇编外，香港还出版了一批文革研究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刘青峰编，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宋永毅、孙大进著，田园书屋，1997），《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徐友渔著，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文革大屠杀》（宋永毅主编，开放杂志社，2002），《晚年周恩来》（高文谦，明镜出版社，2003），《一九六八：一叶知秋——从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谈起》（唐少杰著，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等等，囿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3. 海外方面的进展

近年以来，海外文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的热潮，无疑是一个异军突起的领域。因本文意在介绍中文相关资料，这里就不涉及英文及其它外文的资料和成果了。

A、红卫兵资料汇编

目前已整理出版的有周原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一部分》二十卷，和宋永毅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二部分》四十卷，分别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于1999年和2002年出版。第一部分收入全国各地红卫兵、群众组织小报近500种，其中30多种为全套，既自创刊号至终刊全部收齐，包括增刊和号外。重要的小报如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出版的《新北大》（全）和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出版的《井冈山》（几乎全）。第二部分所收的全部为北京地区出版的小报，共456种，其中200多种为全套或几近全套。重要的小报包括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及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由宋永毅主编的《新编红卫兵资料，第三部分》，计画为五十二卷，目前也已基本编迄。第三部分所收为北京地区以外其他省市的群众组织小报，逾一千五百种，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出版。

在此之前，中国研究资料中心还曾出有《红卫兵资料》（20卷，1975），《红卫兵资料续编一》（8卷、1980）和《红卫兵资料续编二》（8卷、1993）。该系列收录内容除小报外还有文革中群众组织出版的各种刊物，是国外收集、整理、发布红卫兵及群众组织所出版资料的最早成果。

以上两个先后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大套系列资料，收录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两千多种，范围涉及全国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对北京地区出版的小报收录尤为齐全，是研究文革、特别是研究红卫兵运动、群众组织运动十分宝贵而难得的原始资料。在目前大陆各图书馆的同类收藏尚未系统整理发布、不向公众开放的情况下，这两套系列资料对文革研究者的价值，尤显突出。

B、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

这是一套已经出版了千余册并且还在继续出版的资料汇编，是由位于洛杉矶的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选编、出版。所含资料包括1949年以来中共的各种内部出版物，其中涉及到文革的资料在已出版的部分中占主要比例。由于文献的类别、性质，汇编所含内容略显庞杂，各辑、各分册的史料价值也各有千秋，良莠不齐。但总的说，还是一套很有价值的、研究中共及文革的重要资料。

C、两种重要的工具书

最后再介绍两种海外出版的、有助于文革史料研究的工具书。

一是宋永毅、孙大进编著的《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998)。该书著录1996年以前中、英、日文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文章共七千余条，分十四个大类编排，是迄今见到的规模较大、专收文革研究资料的唯一书目索引，是学者、研究者了解1995—96年以前所发表的文革研究成果的便利工具。

另一种是由日本学者罇泽彰夫编著的《红卫兵新闻目录》(东京博二出版，2005)。编者为红卫兵小报收藏家，是日本文革研究学会的会长。该目录实际上是一本日本所藏红卫兵小报的调查目录。该书虽以日文出版，但因书的主体是以中文著录各种小报，不懂日文的中文读者仍可借助使用。

4、文革资料的网上发布

网路的出现，给整个资讯发布和传播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也给文革资料的发布以及文革研究成果的交流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非常有效的途径。随著网路技术的日益普及和网民的不断增多，通过网路发布文革资料和研究成果不但简便可行，少受时间及地域的限制，而且可获最大范围的读者。在突破官方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发布文革资料或研究成果设置的限制方面，也有独到的优势。因此，会逐步成为文革资料和成果发布最具活力和最富前景的一种方式。现就笔者所知的有关网站，择要简介如下：

A、《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

《华夏文摘》是海外第一个中文电子刊物(1991年)和广为人知的中文网站。其下属的文革博物馆网页建于1996年(华新民主编)，目前分为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史海钩沉、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国际风云、人物追踪、文艺作品等八个“展厅”。已出400多期数百万字。它目前的网址为：<http://www.cnd.org/CR/pref.htm>。

B、澳洲国立大学的“中国1966—1976电子档案”网站

该网站目前发布有几百种文革期间各个时期的印刷品，主要为非正式出版物或是非出版印刷品，所收都是原件，扫描后以图像形式发布，原汁原味，别有一番“原始资料”的风味。惟材料组织上缺乏系统，有待进一步改进。其目前的网址为：<http://anulib.anu.edu.au/subjects/ap/digilib/chi/cr/china.html>。

C、中国文革研究网

该网站是近年间建立的，在观点上明显“左倾”的文革研究网站。目前列有文献、文革研究、文革口述、万象视野、百花齐放、民谣、文艺、美术、论坛等栏目。该网站选取与刊载的文章与评论，对毛泽东及其时代、包括文革，多持维护以至赞扬的观点，对后毛时代多持批评与否定的观点。该网站目前网址为 <http://www.wengewang.org/>。

C、渤海大学文革史网站

这个网站由位于辽锦州的渤海大学历史系所创建与维护。中国大陆的一所高校敢于创建这样一个以文革研究为主旨的网站，勇气可嘉。所收资料、文章范围较广，但目前数量仍然有限。然从该大学已设立了文革史研究所，建立了文化大革命史展馆，并举办文革史料搜集与整理研讨会等系列举措来看，这个网站的发展值得期待。该网站目前的网址为：<http://www.jznu.edu.cn/page/depart/lxx/wenge/index.htm>。

D、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该网站由旅美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女士创办，专门为纪念文革众多死难者而设。收集与发布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人们的名单、生平，以及受害者的不同故事，致力于“记录每一位元受难者”，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无人知晓的普通人。其网址为：<http://www.chinese-memorial.org/>。

简短的结语

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后代学者对于前人研究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史料上突破的。尽管有种种不应当有的政治阻力，四十年以来文革史料的搜集、校勘和整理出版，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以海外的中国学者为主体的有计划地保存、征集和大规模地出版文革史料，为文革史料学的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不仅在国内以种种方法坚持出版文革史料，还通过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在海外出版被禁止的回忆录和工具书等等。纵观这四十年来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学的发展，不仅在对编撰史料的原则、角度、内容、类型等方面，就文革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真伪、参照等方面也都在这些大型的文革史料出版项目中——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和《新编红卫兵资料》——有所涉及和探讨。这些都标志著文革史料学的良好发端。现代化电脑和网路技术的发展，为文革史料的征集出版和整理研究提供了传统的印刷出版所无法提供的绝对优势条件，并对冲破政治阻力、传播文革史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以预料：今后几十年的文革史料的整理出版会有更大的起色，网路和多媒体的现代电脑技术所支持的电子出版物也会使它的发展更加“有声有色”。

注释：

1. 转引自谢咏 <回到傅斯年>，载他的《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2. 这方面出版物众多。在中国通史领域，有陈高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谢国桢的《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断代史方面，有谢尔康的《清史史料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在近现代史方面，有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和张玉法的《中国现代史史料指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2年等。
3.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往事追忆】

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 迟泽厚 •

1971年，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随即按照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为推动运动发展，印发了大量揭发批判林彪的“红头文件”。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上印发了几十份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文件、资料，其中除了专案组的大块文章，还有十多份来自曾与林彪共事者的揭发。对专案组发布的那些材料，这里姑且不予评论：单说那些曾与林彪共事过的党政军界名人，他们本有条件写出最能反映林彪真实情况的材料，然而现实情况却令人极为失望。我于1953年5月从部队基层调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机关，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对林彪本人和四野部队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林彪昔日战友们所揭发的材料竟与过去我所了解的迥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1972年3月2日上午，原标题《刘伯承同志揭发林彪罪行谈话记录（摘要）》，内容如下：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彪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弯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彪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彪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彪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彪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彪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彪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彪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彪不学毛主席，却

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谈话》揭发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条罪状，竟然全无事实根据！

许多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四野部队干部，看后反映强烈。刘伯承元帅在军内向以正直厚道著称，我对他极为尊敬。我无法理解，刘伯承元帅虽然已入耄耋之年（时年整80岁），但讲的毕竟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怎能出现这样的谬误？继而我就担心：“红头文件”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所肯定的东西，起着标杆、示范作用，倘若大家都起而仿效，如此这般进行揭发批判，那将把广大党员群众引向何处？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岂不会弄成令全党蒙羞的政治闹剧！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经过长时间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不惜冒巨大政治风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通过指出刘伯承元帅这份揭发材料的严重失实，促请中央避免继续出现这类错误，加强对“批林”运动的领导，确保运动健康发展。

致汪东兴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东兴同志：

知道您很忙，实在不想干扰。但因我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向中央反映，以期引起重视，所以不得不占用您的一点宝贵时间。

不久前学习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看到刘伯承同志一份揭发林贼罪行的谈话记录（见会议参阅文件之二）。这个记录的第三条，是专讲林贼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作战中的罪行的。但是，令我惊异是：里面讲了八件事，不是完全违背历史实际情况，就是观点有严重错误。现列举如下：

一，记录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记录中所说的“那里”，显然是指中南地区和西南部分地区，因为四野部队从未到过二野原来所在的华东地区。我不知道二野的领导当时是否请求过增援，但是谁都知道，四野部队在二野部分部队（主要是陈谢兵团、即4兵团）的协同配合下，主要负责歼灭中南地区的蒋匪军；尔后二野部队又在四野的支援和一部分部队的直接配合下，进军大西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不应和林贼的阴谋活动混为一谈。

二，记录说：“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意思好像是二野部队首先解放了广州，

四野部队不但落在后面，而且根本不该到广州来。而据我所知，解放广州的主力并首先进入广州的，是四野15兵团的部队；以后15兵团机关就长驻广州，并兼广东军区机关。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

三，记录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解放海南是四野40、43军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于1950年4月中旬实施的。渡海部队突破了蒋匪海空军组成的所谓“伯陵（匪首薛岳字）防线”，用木船打败了兵舰，在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下，艰苦作战半个月，粉碎了10万敌军的抵抗，歼敌3万余，解放了海南全岛。这个胜利来得并不容易，而当解放海南时，二野部队早已进入大西南四五个月之久；二野部队过去也并未进驻雷州半岛。这里无法理解，二野部队同解放海南有什么直接关系。

四，记录说：“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据我所知，四野部队（主要是13兵团）在衡宝战役结束后，是追歼白崇禧匪部进入广西的；15兵团之一部及二野4兵团，则从南线粤桂边进入广西。在南北两线都不存在什么谁“随着”谁的问题。

五，记录说：“后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 and 川军大部解决了，共90万人。”1949年底，蒋匪的残兵败将多数逃到西南，二野在解放大西南中，歼灭了大量敌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在我军战史上还有一个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敌更多的琼州战役。而且，也不知道四川还有个“琼州”其地。据我所知，歼敌90万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琼州一仗”，而是从11月初开始到12月末结束的整个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其间打了许多仗，被歼之敌包括了云、贵、川、康4省的蒋军，其中既有战斗解决的，也有如卢汉、刘文辉等起义的；而参战的我军，除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外，还有从陕南尾击胡宗南匪部进入四川的一野部队一个多兵团。

六，记录说：“琼州”战役之后，“林彪要了25万俘虏，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25万。”二野领导是否主动给了三野25万俘虏不得而知，但四野这25万人，我问过一些老同志，包括过去做军务工作的同志，大家都摇头。有的同志说：“当时自己的俘虏还处理不完呢，谁还大老远地去要俘虏？”

七，记录说：“后来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这里讲的“57军”，应为47军之误（我军根本就没有57军这个番号）；不知为何，却又漏掉了一个42军。这3个军入川，并不是在“琼州一仗”的“后来”，而是在这以前，是实实在在打进四川的。例如，47军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后，最早解放重庆的部队之一。消灭了敌人，自然要收缴敌人的武器。四川解放之后，四野入川各军即陆续按照中央命令回到中南地区，“占地盘”从何讲起？据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同志曾特意宴请四野入川部队团以上干部，再三表示慰问和感谢，并给入川部队官兵发了慰问金（银元）。这事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许多同志至今津津乐道，为什么现在记录竟又作这样的描述呢？

八，记录说：“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这大概是指38军之一部配合4兵团入滇作战一事。这里我不明白，既然4兵团已经占领了云南，38军才“跟着”派出去，如何竟又能深入到敌人的退路上去截击呢？截击敌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前面几条说四野部队不该跟在二野部队后面走，现在却又怪四野部队走得太前了。

当然，个人的揭发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样准确、严谨，凭个人回忆写材料，个别地方不准确是难免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写材料的态度。这个记录材料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它还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气味，是以宗派主义反对林彪的宗派主义。这个记录，未讲到兄弟部队一点好处，却强调他们“并没有请求增援”，而其他部队则死跟在他们后面发洋财，好像解放中南、西南地区都包给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这不但原四野的同志看了会有意见，一野的同志也不会同意，凡是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也都不会赞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是，记录把毛主席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竟和林彪混为一谈，多处把四野部队称为“林彪部队”、“林部”，甚至直斥47军等部队“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这极不利于我党我军的团结。看看张国焘事件发生后，毛主

席是如何把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严格加以区别的，就可知道这个记录的错误了。

这个记录歪曲了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我军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南下作战各野战军的行动当然也是如此。而记录竟把四野进军中南和支援二野进军大西南的行动，说成是林贼一人在那里捣鬼，这样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对全军的统一指挥吗？

而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贼的罪行揭深批透，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见其狠。但由于这个记录材料的严重失实，又经中央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因而不利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原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1920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国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列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我还猜想，也许记录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不强所造成的。

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凭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会错的。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

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把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  
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1972年9月3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这种可能性更大。

我的信于1972年9月6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还注明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20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不作答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击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的。

时间到了1995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兴写信已过去23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舆论一致”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断刘伯承元帅1972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团设置的圈套。这年5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我在信中说：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离休干部。吴忠同志生前，我与他关系密切，经常听他讲起刘帅和您。我对刘帅充满崇敬之情，吴忠同志1988年写的怀念刘帅的两篇文章：《中原主帅刘伯承北渡淮河记》、《谆谆教诲寓深情》，就是由我执笔的。今天，我来到四川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参加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60年前的今天，在刘帅的指挥下，中央红军1师部队，在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的伟大胜利；4天之后，2师又飞夺泸定桥，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计划。刘帅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绩永垂史册。现寄上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为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而特制的纪念邮封一枚，以略表我对刘帅的怀念崇敬之情。

借此机会，我还想将埋藏在心中已20多年有关刘帅的一个疑问，提出来向您求教。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项罪状，竟无一项能够成立，如材料中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彪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按：应为4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等等。稍懂一点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下作战中，二野与四野部队的协同关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动，都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的，而上述说法，则不但是对林彪和四野部队的否定，竟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否定了。

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帅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刘帅名义，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四野部队矛盾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但无论如何，既然材料是以刘帅的名义写成的，史学界对这份材料是会认真研究的。最近我发现，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些有违史实的东西，史学界经过考证后已含蓄地提出批评。刘帅的这篇材料虽然是内部的，但早晚也会公开，史学界也会认真研究鉴别，从而对刘帅的光辉形象造成某些损害。因此，我认为应当趁着您还健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刘帅负责的态度，采取适当方式，对这个材料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作一必要的说明，以防患于未然，消除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军队干部和业余党史、军史工作者，希望在这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不知我的意见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

敬祝

健康长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 迟泽厚

1995年5月25日于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大约过了半月，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将军突然通过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打电话，邀我去他家中。鲁瑞林调广州军区前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来广州后不久即被免职，我与他向无接触，但我知道他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我马上判定他找我与我给汪荣华女士写信有关。

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元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

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帅这个谈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么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却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知，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

我很失望。我满腔热忱想办成的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回应？对方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认为：对方在得到全部资料而且在我阐明利害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态度，只能表明我原来的分析判断有误，对方实际默认了这份揭发材料并非完全出于江青集团的炮制。倘若如此，我岂不是少见多怪、瞎积极吗？

时光到了21世纪第三年，我仍不死心。但考虑到汪荣华女士年事已高，便又托一位名人之后与刘家的后人沟通，希望我原来的设想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还是得不到响应。至此我彻底绝望。

“批林整风”运动距今已经35年，“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30年。这可是一代人的时间哪！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关方面对那一时期形成的大量文件、资料进行清理、甄别，任其成为历史档案。特别是那些出自具有骄人政治身份的名人笔下或口述而形成的档案，究竟算不算数？当今或后世的历史工作者，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35年前我给汪东兴写信时，刚年届不惑，如今则早已年逾古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阎罗天子召见。时日无多，每一起35年前我冒着巨大政治风险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没个说法，我实在于心不甘。特别是，我并不是就事论事，孤立地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长短，我较真儿的是由一篇材料所暴露出来的究竟该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要趁我有生之年，发声呐喊，再次并且在更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以就教于方家、知情者。

最后还要说明两点：一是我在写给汪东兴的信中，指出了刘伯承元帅谈话的8处谬误，其实还不止这些，如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而实际上当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即1949年1月上旬时，林彪、罗荣桓指挥的百万东北野战军早已入关1个多月，协同华北野战军攻占了张家口，正积极准备攻打天津呢！二是早年我给汪东兴的信，今天再看也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当时不得不写的官话套话，令人生厌。但为了反映历史原貌，我一字不改。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2006年7月10日于广州

◇ 附《往事》编者的话：



“九一三”之后，全国一片喊打喊杀。人微言轻的迟先生冒险上书，据实指摘，以促请中央“确保运动健康发展”。种种质疑，至今未消。如果说当年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那么现在则是出于“历史责任感”。

迟先生的怀抱在于一个“真”字。他不明白，何以“党政军界名人”都不讲真话？更无法理解，何以“以正直厚道著称”的老前辈也不讲真话？

其实，刘帅的谈话，“表态”而已。

按照党内生活惯例，每逢“路线斗争”的黑箱作业阶段结束，全党就进入了“表态”阶段，不外乎坚决拥护，揭批罪行，彻底打倒。沾包者唾面自污，落井下石；受压者扬眉吐气，踏上一脚；更无奈者言不由衷，随波逐流。胜利者通过表态，既可检验表态者的顺从，又可以此确认权力之有效性。因此，“表态”只关乎服从，不涉及真相。此即“表态文化”的潜规则。

说违心话，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屡见不鲜，积久成习，连德高望重、功勋盖世者也不能幸免，如刘帅，如总理，如耀邦。在危急关头，顶住压力、坚持己见、拒说违心话的似凤毛麟角，结局人所共见。

迫人说违心话和被迫说违心话，依据的原则惊人一致：维护大局，维护团结，维护领袖权威。

以追求真理相号召的团体为什么要在“违心话”下才有大局、团结、权威？是非的认定为什么不是争论的结果，而是“不争论”的结果？事过境迁，人们才发现，被压抑的声音往往更接近常识，更符合人性，更有利发展。靠大家说违心话维护的“大局”，其实是困局、危局、死局；维护的“团结”，不过是延缓、掩盖了矛盾，化明争为暗斗，积表疮为内患；维护的“权威”，最终成为家长专制的一错到底。

事实证明，面临重大历史事件，说违心话的人越多，职位越高，时间越久，后果就越严重。后人固然应该给他们以同情、宽谅，更应该反思乃至根除造成这种现象的体制性弊端。

从迟先生写那封信到现在，三十四年过去，“路线斗争”的提法已被废弃，“表态文化”却余音犹存，只不过退化成一种“表演文化”。同样的言不由衷，表里不一，现又演变成演员假装演，观众假装看，导演假装相信演出效果。虽说是“走过场”，但“过场”总得“走”。沦落至此，说潜规则是客套，惯性罢了。

□ 原载《往事》第四十一期，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

【往事如烟】

一个普通大学生怎样走入文革

• 聂树人 •

千万双眼睛看得见：我们当年做的事，十年后能见人，百年后能见鬼，千年后能见史。——作者志言

1966年，文革犹如丁香，一夜之间在中国大地爆发。

4月底，我们结束了在陕西的“四清”工作，回到学校。此时，报刊上批判“海瑞”和“三家村”的文章天天都有。虽然，我们还不明白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含义，但是谁都明白，又一场政治运动已成山雨欲来之势。

回到学校后，政工干部们一再号召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什么是实际行动呢？谁也说不清。我当时想，能在报刊发表批判文章，那当然是响当当的实际行动，也是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但是，不要说我们理工类院校的学生，就是文史类院校的学生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难上加难。因为大家一不占有资料，二不明白批判那几个“文人”的意义和方向。而且，纵使大家都能写出“高水平”的符合主政者口吻的批判文章，报刊上又哪里有那么多版面刊登？说到揭发，对于“上面”，对于“外面”，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又能知道什么呢？因此，我们的所谓“参加”，不外就是自己看看或集体念念报纸、杂志上的批判文章，然后，再进行空对空的表态性发言。

大家很困惑，对这种“空对空”的参加不过瘾，觉得有力无处使，很无聊。

1966年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同时，还刊登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中将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那时，我对“评论员文章”中的许多话还很不理解或感到迷惑。比如：

——从“‘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这半句话中，至少可以“发掘”出“反党集团”的其它分子、骨干和头子。这些人当然在上头，因为下文紧接着说：在前一个时候，他们采取“牺牲车马，保存主帅”的战术。现在主帅垮台了，他们就采取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手法。他们妄图保存实力，待机而动；“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们是谁呢？

——“他们‘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组织严密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多年，却还存在“多年来一直盘踞的反动堡垒”，这可能吗？如果有，它或它们在哪儿？

从功利观念出发，我当然很愿意在参透了这“禅机”之后，向这“堡垒”射出几发重磅炮弹。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已经到了五月十四日，陆平还传达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所谓紧急指示，并手忙脚乱地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对于“北京市委大学部”这个单位，对于“副部长宋硕”这个从未光临地质学院的大人物，以及他的“紧急指示”，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不幸的是，刚一听说，他们就进了“反动堡垒”，成了“反党集团分子”！

宋硕的“紧急指示”会传达到北京大学，当然也会传达到北京地质学院。由此想开去，地质学院的党委也会有“进行部署，欺骗、蒙蔽和压制广大青年学生和革命干部、革命教师，不许他们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之嫌疑。北京大学党委这样做，成了“反动堡垒”，北京地质学院党委这样做，上纲到“反动堡垒”是太高了，但是，说它犯有错误，总不会过分吧？

无论我心里有多少迷惑，但是，我对“评论员文章”中，“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份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这段话，既有认同感，也有许多联想。从中学到大学，从受到批判的“准反动学生”到受到表扬的“三好学生”，从“不听话的学生”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乐中，处处都受到“组织”的关怀，处处却潜伏着“反党”的威胁。一些人品并不怎么样的人，一旦有了党员的头衔，昨日处处听他人的话，今日事事却要求他人听自己的话，那人格也立马就高大起来！这究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也没有胆量发出“你们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的疑问，但是，“评论员”这一发问，立即润入我的心田，认为问得好，问得过瘾。

此外，我对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中关于学校运动形势的看法和分析也有颇多的认同感。

地质学院的情形与北大大同小异。“从理论上驳倒他们”，“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地质学院党委也是这样引导运动的。此外，大字报对“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做的细致”等言论的批判，对他们将师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繁琐的考证中，“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的指责，都在我的心中激起共鸣。

“舆论喉舌”不同寻常的举动，表明了形势的“严重”和党中央的态度和决心。我当时极为振奋。大字报，黑帮，反党集团，这些政治名词我们以前听说过，现在都鲜活了起来。

中央新闻媒体在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加肯定的时候，没有一字提及它在1966年5月25日贴出后，立即遭到围攻的情况。（此后，这张大字报还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我也就误认为，以大字报形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共产党所鼓励的，是革命的进步的表现，谁也不敢对此说三道四。

当时，我对“黑帮”这个名词也觉新鲜。这个名词的概念虽然模糊，但是，带有“团伙性质”却不容置疑。再经“评论员”一点拨，它就具体化了，北京大学一下子成了“‘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北大党委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反党集团”。那么，其它学校的领导班子又如何呢？地质学院党委又如何呢？

二三十年来，无论主流舆论对聂元梓如何憎恨和挞伐，1966年6月1日以后的政治背景是，全国各级党委都必须对以她的名字打头的那张大字报表态，因为党发出了声音！当时，只要有思考能力的中国人谁都明白，这篇大字报肯定是毛泽东批示发表的。

6月2日早饭时，学院广播台通知全院师生开大会。虽然没有通告会议内容，但谁都知道，这次大会与昨晚的“新闻联播”有关。

无论我的革命信念如何，却怎么也不能将“中央出修正主义”与地质学院党委链接起来。说心里话，那时，我对地质学院的党委还是信任的。在我的心目中，地质学院的领导人和北京大学的领导人不一样，北大是中央直管的“一流”院校，有着贵族血统，学校领导“通天”。地质学院只是个“二流”或“三流”院校，院长高元贵有没有“通天”的本领不得而知，但是，全院师生都知道他没有“通天”的嗜好。我们上大学不久就听说，地质部的“家长”，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何长工（部长是李四光）对高元贵很不满，曾在地质学院大会上指责他“三年不登我地质部的门”。

在我看来，地质学院的党委更不可能与“反党集团”有关联。虽然早在四清运动时，《二十三条》就提出“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也并不认为地质学院就一定有这种人。我曾经在北京房山县参加过农村的四清运动，在陕西武功参加过西北区测队的社教运动，我所在的工作队虽然按照上级的布置，对领导干部进行了“赶上楼”、“洗温水澡”之类的整治，但是最后没有定一个人为走资派。对于群众强烈不满的干部，充其量不让他当干部就是了。

当时，我也没有想过，在地质学院能抓出多少个走资派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尽管学院党委在开展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上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有“捂盖子”之嫌，但是又认为，追究他们的领导责任或挖他们的老底子是小题大做。我相信地质学院党委和各级领导干部的革命性，我们入大学三年多来，他们一直教导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永远跟党走。谁能想象，这样的党组织会与党中央离心离德甚或反对党呢！

走进会场时我还想着，院党委成员在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之后，一定会立即行动起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学校前段运动有个总结，对下段运动有个激动人心的安排，带领我们去冲锋陷阵。

大会内容果如我们所想，是有关运动的。但是，代表院党委在大会上讲话的，不是新任党委第一书记的王焕，也不是上年才卸掉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院长高元贵，而是党委常委、副院长周守成。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情，第一、第二把手不出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是，这只是一闪念，很快就让位于其它的“闪念”了。

周守成在开场白中，把他的讲话叫“检查”。学院党委公开向师生作检查，我进大学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使我感到兴奋。

大会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令人失望的是，周守成代表党委所作的“检查”和对下段运动的安排与我们的预期相去甚远。对学院前一阶段运动“死气沉沉”的局面只字未提，只是将“学习不够”，“跟得不紧”，“力度不大”之类的官话、套话说了许多。名为检查却没有“检查”一条具体的失误或错误，压根儿就不承认党委有什么错误，给人一种捂着、盖着，还要继续捂着、盖着的感觉。显然，地院党委的检查，只不过是北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以陆平为书记的北大党委成为“反党集团”后，对自己领导运动不力的一种很不高明的蒙混过关式的“洗脱”。

说心里话，那时我们已经对不着边际地批“三家村”烦透了，对报纸上批海瑞的文章则感到茫然。我们很希望党委能带领我们结合学校实际，来个“刺刀见红”，抓出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是，周守成在谈到对下段运动的安排时，也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放手发动群众”，而是继续坚持既往政策和方针，“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一切听从领导安排。

这些，党中央支持的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中，不是已经批判过了？地院党委为什么还这样

搞？这不是划框框、定调调，压制群众搞运动，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么？不要说我们学生，就是学校的老师，对上面的人能了解些什么？对外面的人和事又能知道些什么？不知道，揭发什么？而“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中的“后”，又“后”到什么时候？周守成都没有说。我认为那只能是遥遥无期的说说而已。最后，周守成还要求师生，不要在外面贴大字报，必须贴在指定的地方（在哪里？没有说），更不要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

那么，地质学院的运动如何开展？我的想法是，群众对自己单位的情况最了解，单位的问题当然主要依靠本单位的群众去解决。从另一个角度说，无论是上级单位，还是外单位，不是都有群众嘛？各单位的群众都起来揭发本单位的问题，把本单位的事情搞好，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也就搞好了吗？因此，我认为，周守成的“先”没有实际意义，他是在以“先”压“后”，不让大家揭发学校里的的问题，是在“捂盖子”。地质学院的党委和领导干部有没有问题，谁也别先下结论，按照“四清运动模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自我进大学以来，学院党委和政工干部一直要求我们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保留下来的很少的“日记”中，还保留着周守成在1965年3月10日全院大会上作“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时的讲话，他说：

1、个人主义，有个人主义的人是必然要碰钉子的。不克服个人主义，到处都要出问题。这决定了一生是作革命派还是作革命的靶子。

2、和平演变的原因就是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进行斗争。只有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前面的人，才会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否则，只能因患得患失而逐渐变质，最后成为革命的靶子。

可是现在，周守成和院党委的自我批评精神到哪儿去了？周守成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几位？党中央的指示和号召明明白白地摆在大家的面前，院党委自己却为什么对党中央的指示打起折扣来？“以身作则”的精神哪里去了？这不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作风吗？

由此，我有了被愚弄的感觉。我原先并不认为地质学院党委有什么大问题，还没有将他们和“黑帮”联系过。经周守成这么一抗一掩，反倒认为“有问题”了。至少，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最大的问题！在愤愤不平之后，心中不免产生了一个大的疑惑：难道地质学院党委也如北京大学党委那样，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关，也与“反党集团”沾边？不然，为什么那么害怕群众揭发？

6月2日中午饭时，校园里出现了许多对院党委检查表态的大字报，其中也有我们的。

我对周守成代表党委所作的检查很不满意。

开完大会回宿舍的路上，我所思所想绝对不是揪谁批谁，而是想，如何以实际行动向党表达我的忠诚。

毋庸置疑，我们是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代人。革命传统教育的后遗症之一是唯意志论。我们都经历过“人定胜天”的年代，“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那时，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都以共产党人自居，认为自己迟早有一天会成为共产党员。因此，我们的理想高高在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教育造成我们盲目的参政热情，加上对毛泽东崇拜和对共产党热爱的感情，使我们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大家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在这次运动中建立功业。

时刻想着接受党的考验，是后遗症之二。我们这些在长期造神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被政工干部们告知，因为没有经历过抗战、过江、抗美援朝，要在政治上获得资本，成为共产党依靠的对象，成为共产党组织中的一员，就只有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投身到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那时，我对“靠拢组织”的说教很不理解，不知该怎样做才算是“靠拢组织”？没有事情跑到政治辅导员那儿去干什么？若干年后我才明白，所谓“靠拢组织”，就是要不断地找政治辅导员汇报自己的思想，汇报班上和周围人的思想和活动，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要留心，特别是“反常”的言行，要尽可能将这些情况以口头或书面（“小报告”）的形式报告。这样一来，不就有事由接近政治辅导员了？但是，如果这叫“靠拢组织”，我是绝然做不到的。这正如演员，演惯了反派人物，演正面人物总觉得有点不像。弄不好，还会被政治辅导员视为别有用心。因此，我同政治辅导员的关系早就形同路人，我们在路上碰了面，除了皮笑肉不笑的一笑外，再无其它表示。于是，铁下心我行我素，搞起自我“修养”。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如果院系党组织的领导到班上征询事关党组织发展这方面的意见，班上同学能第一个推荐我。

无论如何，我都视自己为共产党的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把积极投身这一运动作为党对自己的又一次考验。我认为，应该光明磊落地向党组织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院党委不能积极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又如何能带领我们去进行文化大革命？他们既然一直要求我们做完人，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那他们就首先得是完人，应该言行一致。

对“革命”的盲从，是后遗症之三。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最重要的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类“实事求是”的教育，胜过了“要汲取‘反右斗争’教训”的训诫。我坚信，凡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的书本上写的，就一定可信；凡是党报上肯定的，就一定正确；凡是大人物讲的，就一定能兑现；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就一定能实施；凡是为真理而奋斗，就一定会受到公正对待；凡是为人民大众奋斗，就一定会得到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赞许和支持……1957年50多万中国精英被“杀”为右派，原本就包含着“杀鸡骇猴”之意。但是，这情景我们并没有亲身体验，政工干部从来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些“右派”所以成为“右派”的真谛，“反右英雄”所以成为“反右英雄”的奥妙。对此，他们从来都讳莫如深！因此，直到1966年，我们也不大明白给党组织或党员提意见将会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所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播，一登，再加上“评论员”文章一“点”，我就把持不住自己了，一门心思地想着革命、想着接受党的考验，也相信毛泽东和其它革命大师对批评者的承诺，相信党章、党中央决议和红头文件中“不准打击报复”之类的信誓旦旦，于是，就忘乎所以地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了，就要对周守成的“党委检查”说三道四了。

对“民主”的追求，是后遗症之四。1966年6月1日，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丝可以有限表达民意的曙光，舆论一律的大一统局面出现了减压的迹象。亲历过1957年的中国人，到了1966年仍然心有余悸。求真的声音，变革的声音，未来的声音，都成了异端邪说。压制以至镇压民意表达的机制不仅招致前代人的憎恶，也遭到我们这些后代人的反感。显然，这些人做梦也想有一个意愿表达的机会，希望有一个冤屈昭雪的机会；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也希望有一个向当权者进言的场合。于是，十年沉默，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得以表达和爆发。

显然，这种爆发的前提是，毛泽东对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坚决支持，由于这种支持所开创的社会政治剧烈变动，而招致的政治压力的突然降低。只有在这时，才最容易体现民意的影响力。人们因为无须顾忌被孤立被打击，才有可能较清楚地辨认自己，表达自己，较为自由地行使属于个人的天赋权利。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当然也想试一试。

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写一张大字报。

说心里话，虽然对周守成代表党委作的检查不满，但是，真要让我揭发，我还揭发不出什么问题来。我们这些普通学生，经常能见到、接触到的领导干部就是年级的政治辅导员老师。这些人都是刚刚毕业或毕业后留校不久的大学毕业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们能有什么根底，有什么问题？而系里、院里的领导，离我们就远了，一年见不上几次，还大都是在全院性的大会上，我们坐在下面仰望着主席台上的他们。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的，别人就一定不知道？做坏事的时候，谁又会敲锣打鼓，四处张扬？我不仅对周守成限制群众手脚的措施不满，更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表示了对“先外后内”、“先上后下”的否定，周守成却在还坚持，这显然是对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对抗。而在对抗的背后，又掩盖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

回宿舍后，我已经打好了腹稿，拿起笔就写。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正文共两张大纸，不足一千字，其主要内容是对周守成坚持的“先上后下”、“先外后内”不满，希望院党委紧跟革命形势，正确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抛弃错误观点，带领师生对学校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将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大字报写完之后，我还是心存疑虑，怕字里行间出现政治问题或其它漏洞，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辫子制造一场“文字狱”，就请和我住同宿舍的好友沙丁茂、孟繁华审阅。同时说明，如果他们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它也可以作为我们三人共同的“作品”。他们看了后，愿意在大字报上签名。我们略一思索和商量，就在大字报的最后写下了“11622班 聂沙华”的落款。

“聂沙华”！这算不算一次“结党”？算不算一个“反革命集团”？如果局势翻个个儿的话。

去食堂吃中午饭时，我们三个人顺便将大字报挂“贴”在本系食堂东侧的一根铁丝上——当时食堂的四面墙上已经贴满了内容相似的大字报，没有“下足”之地。

那么多大字报与我们的字报相呼应，表明许多人和我们的看法相同。如果学院党委能反过来，来个“先内后外”，“先下后上”（即先本单位，后上级单位）的政策，不仅我没有意见了，我想全院的师生也就没有意见了。

“一边倒”的大字报显示，学生们都不再是旁观者，人人都成了斗士。

我从此卷入文革。

作者简介：聂树人，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文革中，先后任“首都三司”宣传部长兼《首都红卫兵》报主编、核心组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主要筹建者，常委，首任宣传组长；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 原载《往事》第五十七期，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